

高陽
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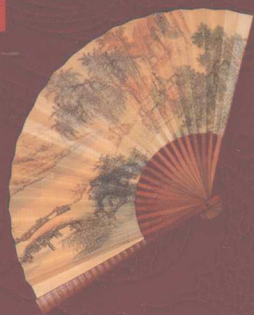
高阳
◎ 著

历史小说

清东西公子



QINGMOSIGONGZI



华夏出版社

I247.5/374+24

20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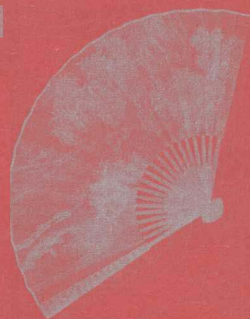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小说

清末四公子



QINGMOSIGONGZI

中国文联出版社
北京

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末四公子 / 高阳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5080-4550-4

I. 清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9016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清末四公子

作 者: 高 阳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垢文涛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10 1/16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210千字

版 次: 2008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0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7.00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前言

同光年间的政风，与康熙末年相近。以我个人的看法，清圣祖将地方官分为六等：爱民、干练、清廉、不好名为第一等；爱民、干练、清廉为第二等；爱民、干练、虽贪不苟为第三等；清廉、才具平常为第四等；才具平常、操守不佳，但能实心办事为第五等；贪污无能兼而有之，则为第六等。在圣祖心目中，汤斌不过第二等人物，即因误认汤斌在江苏巡抚任内，有与帝争名之意。张伯行号称“天下清官第一”，其实，圣祖视之为第三等人物。他曾说过：张伯行喜欢刻书，哪里来的钱？言下并不以为张伯行一清如水。但在表面上仍评张为清廉。由此可知，他将清廉的标准打得极低；上谕中屡次表示，只要真能为地方生利，有益于民，享用稍过，不足为罪。至于用人，除了上述的第六等人物以外，第五等以上皆能容忍，第三等以上则必蒙温旨褒奖了。

同光朝慈禧太后当政，识人、用人虽不及圣祖，而想法大致相近。因此，在那时候的地方官，自督抚至州县，收陋规以及三节两寿（本人及太太）收礼，视为当然；卖官鬻缺，营私舞弊，只要不太过分，不得罪“都老爷”，亦可无事。举个例，《能静居日记》作者赵烈文，据沈云龙教授记其生平，同治八年为曾国藩奏调赴直隶，十月奉旨署磁州知州，在任一年七个月；同治十一年正月署易州直隶州知州，至光绪元年去职，在任三年有余，前后并计，不过做了五年地方官，而自光绪元年九月回南，“隐于乡里，大治园林，广置姬妾，颇娱声色之好，以迄逝世”。赵烈文歿于光绪十九年六月。五年作吏，廿载坐享。烈文犹为贤者，尚是如此，他人可知矣！

至于京官，贿赂公行，亦无足为奇。翁同龢日记中，常记某人馈赠，“受之”或“却之”，大致受者多而却者少。翁同龢尚且如此，孙毓汶之流可知矣！

因此，同光年间，袁父兄余荫，出现了许多声色犬马、无一不好的“大少爷”；今有达官之子，或则胸怀大志，卓尔不群；或则真慕风雅，诗文有声，与酒食征逐的纨绔，大异其趣，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。“清末四公子”即以此得名。与“明末四公子”相较，文采相若，风流未逮，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。但求之今日，亦戛戛乎难哉！

高阳作品

“清末四公子”者，湖北巡抚湖南浏阳谭继洵之子嗣同；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三立；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保初；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惠康。或以为无丁惠康而有陕甘总督浙江嘉兴陶模之子葆廉。要之，谭陈必在其列，断无可疑。兹请先谈陈三立。

目 录

陈三立	(1)
丁惠康	(137)
谭嗣同	(162)
吴保初	(213)

陈 三 立

陈三立字伯严，别号散原。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有西山，一名南昌山。据《水经注》，即古散原山。陈三立父母皆葬于此，又筑庐为其父归隐之处，因以散原为号。

散原籍隶江西义宁州，即今修水县。义宁在唐朝分武宁县地所置，故名分宁；宋沿旧名，元、明、清改称宁州，直至嘉庆六年始改名义宁州，入民国后又改为修水，称义宁者不过百年，以故今人多茫然不辨其地。

此地曾出一大诗人，即宋朝的黄庭坚。《嘉庆一统志》载：

黄庭坚宅在义宁州西二十五里，双井北岸，有永思堂，旁有钓台，下有水曰“明月湾”。

黄庭坚是“江西诗派”的开山祖师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及《云麓漫钞》，皆载吕本中所作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，当时有名者即三十家，成为宋诗的代表。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，黄庭坚及二陈——陈师道、陈兴义的高处，原在“文章自得方为贵”，只以浅夫妄人，凡无病呻吟，故作穷饿酸辛之态者，皆遁入江西诗派，致自金、元开始，即为世所诟病。直至清末，张之洞犹有“江西魔派不堪吟”之叹。但散原之出，大昌了江西诗派，不妨谓之为直接山谷法程，八百年先后辉映，即此已足不朽。

散原的尊人陈宝箴，字右铭，以举人而官湖南巡抚，与左宗棠的以举人而入阁拜相，复同为翰苑出身的元老重臣所尊重，皆为难能可贵之事。陈宝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，其时洪杨之祸，已成燎原，宝箴佐其父在籍办团练，直至咸丰六年丙辰始入京会试，落第后留京读书。黄秋岳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记：

初先生庚申（按：庚申为咸丰十年，所记有误），会试落第，留京师三岁，得交四方雋雅之士，于易佩绅、罗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，时称三

君子。会咸丰北狩，先生条防守六事，上枢府，适当道忧通州仓米为寇掠，骤无所为计，先生曰：“设传驼更运，前明于忠肃成法也。”由是旦夕毕移辇下。一日饮酒楼遥见圆明园火光，因捶案大哭，尽惊其坐人，时易罗约南还将湖军；遂归湖南，易以前受骆秉章檄，募千人号“果健营”，防来凤龙山间，罗副之，遂与先生俱扼次岩塘，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，死守累月，粮且尽，先生独身间走沔州永顺以募饷。永顺守张修府故儒吏，延见右铭先生风雪中。

见其单絮衣，乃取狐裘覆之，先生却曰：“军士冻饥久矣。”即“何忍独取暖为”？张为流涕，趋召父老输银米济军，得即持去，守益坚；石不得逞，引去。

此当为咸丰十年冬间之事，咸丰十一年八月，曾国荃克安庆，曾国藩自东流进驻。平洪杨的军务，至此始有把握。散原述其尊人行状云：

曾文正公大治兵，用两江总督屯安庆，府君稔曾公命世伟人，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贤士，遂往游，曾公引为上客，喜过望曰：“海内奇士也。”幕僚亦争交权，相引重。李公鸿裔专幕职，尤挟府君得代己，府君雅欲亲战事，谢去，就席公宝田江西军，道彭泽鄱阳间，饥民连数县，赈者率应故事，势且尽毙；府君惻然，就逆旅斋沐起草，驰书巡抚沈文肃公陈其状，并类及江西政要所关，凡数事。中言“赈而不能活，犹弗赈；活而不能久，犹弗活。”沈公感悟，大发帑全济无算。其时江西为寇冲，蔓延郡县，余军多观望，独得席公军支柱四应，席公自府君至，累用奇策决胜，然寇方蚁集，势盛，而席公军单，沈公席公又颇乖隔，不相能，每军牍往还，席公辄取抵地曰：“吾死此文法吏矣！”府君笑曰：“沈亦贤者，坐不知公耳。”因谒沈公极陈席公沈鸷，“必能用智略平寇，胜艰巨，明公当开布腹心，席必为尽死，不则席败，大局危，公安所惜足乎？”沈公以为然，立增席公五营，遗书披诚相拊慰！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结，卒以残寇，竟大功。

右铭善于调停。曾国藩与沈葆楨因争饷而生嫌隙，亦赖右铭一言而解。朱克敬《暝庵杂识》记其事，极为生动：

曾国藩移军安庆时，与江西巡抚沈葆楨约厘捐均归大营，有事则分兵回救，既而江西寇四起，曾军益东，葆楨惧救不时至，上疏请留厘金养兵，诏许之。藩疑葆楨卖已，绝不与通，葆楨以书谢，亦不答。会陈右铭游江南，闻之往见国藩，从容言曰：“舟在遇风，舵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；父子兄弟若不相容。须臾风定舟泊，置酒慰劳，欢若平时，甚矣小人喜怒之无常也！”国藩曰：“向之诟惧舟之覆，非有私也。舟泊而好，又何疑焉？”右铭曰：“然！曩者公与沈公之争，亦惧两江之覆耳；今两江已定，而两公之意不释，岂所见不及船人哉？”国藩大笑，即日手书付沈，为朋友如初。

席宝田是湖南东安的秀才，与老湘军中发达最早、而晚境平淡的刘长佑，是岳麓书院同窗。洪杨事起，皆从江忠源援赣，十年转战，不出江西，但曾建一颇出风头的大功。《中兴将帅别传》卷二十三，记曾国荃克江宁后，洪秀全之子洪福南奔，自皖南，经浙江开化，入江西玉山西行，为席宝田所获事：

伪小天王洪福奔广德，合贼众万余人，由皖边出开化、玉山西行，遇别将扼战；走泸溪斜趋山谷间。九月，公遮之于新城，已遁；遂率轻兵疾追，数昼夜犹不及寇。军士久疲，议休止，公曰：“洪福，寇倚以号召；行与瑞金寇合，不可得矣！寇奔逸数千里，日夜疾行，辎重妇女相随属，见无追军，惫甚，行必缓；我亟趋间道，要击广昌、石城间，寇可灭也。”仍勒军传餐而进，越二日己酉至石城之杨家牌，危崖阻纡数十里，日向暮，前锋扬旗植山下止不进。公怒曰：“渡岭冠即是，奈何懈军心耶！”令斩以徇。于是诸将皆奋薄而上，平明岭尽，果见寇，方炊，寇亦顾见，因骇奔。我军呼啸压击，俘斩过半，遂擒伪王洪仁玕、黄文英、洪仁政及他渠酋数十人，而洪福脱免。令军中所俘小儿牧马者，语其曹曰：“小天王过此矣！”辛酉，部将周家良因就擒之，果洪福也。

按：泸溪今名凌溪；其南新城，今名黎川，而席军所驻的金谿，则在泸溪西北；自金谿南下至建昌，趋东南则为新城，直下微偏西则为广昌，皆有大路。席军在新城拦截未获，洪军拟由山路入瑞金，则计惟抢先一步，在广昌与其南位处山谷的石间设伏邀击，始为上策。据散原述其父行状，建此策者即为右铭。

此役叙功，巡抚沈葆楨得头品顶戴、一等轻车都尉；席宝田赏云骑尉、黄

马褂；陈宝箴叙知府，超授河北道，驻河南怀庆府。其后累迁至浙江按察使，因事免官；至光绪十六年，始因云贵总督王文韶之荐复起，其时散原已经通籍了。

散原是光绪八年壬午中的举人。其时清流之势正盛，“翰林四谏”中的宝廷与陈宝琛都放了主考。宝廷主试福建，经富春江入闽，中途纳江山船妓为妾，归而自刎，即李莼客诗：“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”这一重公案。

这一科，福建的解元即是郑孝胥；散原则在江西获隽，所以与郑以同年相称。郑孝胥海藏楼诗，陈宝琛沧趣楼诗，并为近世诗坛大家。二陈师弟的酬唱，尤称佳话；《一士类稿》中《谈陈三立》一文记：

光绪八年壬午，陈宝琛典试江西，散原为所得士，深邀鉴赏，师弟之谊颇笃，晚年情感尤挚。八十生日，宝琛赠诗云：“平生相许后凋松，投老匡山第几峰？见早至今思曲突；梦清特地省闻钟。真源忠孝吾犹敬，余事时文世所宗。五十年来彭蠡月，可能重照两龙钟？”想见白头师弟之风仪。诗之首句：本事即在壬午闱中。洪钧（同治戊辰状元，宝琛同年友也）时以江西学政充乡试监临，与宝琛论取士之法，谓宜取才华英发之士，以符“春风桃李”之旨。宝琛则谓宜以“岁寒松柏”为尚，遂以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命题，入彀者多知名士，散原与焉。“平生相许后凋松”，五十年往事重提也。（此诗初稿，本以“相期无负后凋松”之句切壬午之遇合，曾为陈苍虬诵之，后经改定写赠。）民国二十三年，散原北上，省其师。师年八十七，弟年八十二，皤然二老，聚首旧都，共话啣囊，盖欢然亦复黯然云。翌年，宝琛卒，散原挽以诗云：“一掷耆贤与世违，猥成后死更何依，倾谈侍坐空留梦，启圣何天竣见几。终出精魂亲斗极，早彰风节动官闱，平生余事仍难及，冠古诗篇欲表微。”语极工练沉着，于琛宝生平暨本人关系，均道得出，可与宝琛赠诗合看。并挽以联云：“沆瀣之契，依慕之私，幸及残年偿小聚。”“运会所遭，辅导所系，务摅素抱见孤忠。”亦甚挚切。

陈宝琛赠散原一诗，与其前后“落花”诗，皆为脍炙人口之作。未理庵主人说诗精微，谓此诗好处在见身份，而又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历。“真源”一联，概括散原生平，而自明其身份于受者在师友之间，练句之工几于一字不可易。

按：散原晚年每居庐山，故诗中暗用不见庐山真面目之典，而有“投老匡山第几峰”之句；结句照顾起句，而有犹拟偕游庐山之愿，一唱三叹，摇曳生姿。散原挽诗：“平生余事仍难及”，即由“余事诗文世所宗”而来。生死酬唱，不以幽明见隔；昔人诗格之谨，诚不可及。

散原应会试在光绪十二年丙戌，已中式而不知何故未应殿试。会试中式，在殿试以前，犹称“贡士”；必待殿试登榜，始正式成为进士，以主事分吏部行走。徐一士曾记其初入吏部的趣事：

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，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，以宾礼接见；书吏亦昂然自居。继知其为部胥，乃大怒，厉声挥之出。书吏惭沮而去，犹以“不得庶常，何必怪我”为言，盖强颜自饰之词，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？部吏弄权，势成积重，吏部尤甚，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投礼，实大悖体制，散原折其僭妄，弗予假借，亦颇见风骨。散原非无经世之志，而在部觉浮沉郎署，难有展布，未几遂悠然引去，侍亲任所。其父右铭翁（宝箴）在湖南巡抚任，励精图治，举行新政，丁酉戊戌间，湘省政绩烂然，冠于各省，散原之趋庭赞划，固与有力。

散原在吏部一直未曾补缺，所谓“浮沉郎署”，以他的性情是无法忍受的。其时右铭已因王文韶之荐，复起为湖北臬司。散原于光绪十八年弃官侍父任所。光绪二十年散原擢直隶藩司，清史稿本传记：

二十年，擢直隶布政使，入对。时中东战亟，见上形容忧悴，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，以期变不失常。他所陈奏语甚多，并称旨。上以为忠，命治精舍。专折奏事。《马关和约》成，泣曰：“殆不国矣！”

甲午之役，凡清流无不主战。主之者内则翁同龢，外则张之洞。张以江督刘坤一奉旨赴山海关督师，兼置江督。散原时居武昌，特以一电致张，请诛李鸿章以谢天下。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载其事云：

其时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电，以《马关和约》签定，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，此电南皮未作复。右铭先生虽开藩直隶，而散老忠愤所迫，不

遑顾虑，辄敢以危言劝南皮也。予初未审散老此电命意，故甄录不敢遽及。近读散原精舍文存中，自为其尊人右铭先生行状，有云：“马关定约，和议成，府君痛哭曰，无以为国矣，历疏利害得失，言甚痛。”观此，则对和约之不满，义宁乔梓，固一以贯之。

但义宁父子责李鸿章者，又别有说。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又记：

行状又言：“其时李公鸿章，自日本使还，留天津，群谓且复总督任。府君愤不往见，曰，李公朝抵任，吾夕挂冠去矣。”人或为李公解，府君曰：“勋旧大臣如李公，首当其难，极知不堪战，当投阙沥血自陈，争以死生去就，如是，十可七八回圣听，今猥塞责望谤议，举中国之大，宗社之重，悬孤注，戏付一掷，大臣均休戚，所自处宁有是耶？其世所蔽罪李公，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，卒不往。”得此一段，不啻兼为散老之电下一注解，盖义宁父子，对合肥之责难，不在于不当和而和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，以合肥之地位，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，明烛其不堪一战，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，下怯于书生贪功之高调，忍以国家为孤注，用塞群昏之口，不能以死生争，义宁之责，虽今起合肥于九泉，亦无以自解也。信繇斯说，则散原当日之愤激，自在意中，固卓然可存。原电云：“读统电愈出愈奇，国无可为矣，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，力请先诛合肥，再图补救，以伸中国之愤，以尽一日之心，局外哀鸣，伏维赐察。三立。”按散老此电，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发，戌刻至江宁者。

以右铭、散原父子的性情，看不惯李鸿章的作风，为理所必有。右铭不惜以弃官表示对李鸿章的深恶痛绝，本无人作排李前驱之意，但其时为光绪所信任的翁同龢，与为慈禧所信任的荣禄，皆欲排去李鸿章，所以右铭的决绝表示，适足为翁、荣二人进言之资，无形中成了李鸿章回任的一大阻力。

按：李鸿章于同治九年接曾国藩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中除光绪八年三月丁忧，去职一年三个月以外，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内召为止，历时二十二年之久，任内手创北洋海军，统辖淮军数十万，遥制两江所属有关洋务的各机关，军权、财权、外交权，几乎双手尽握。一旦解任，不知百孔千疮有多少毛病会暴露。因而以盛宣怀为首，千方百计想为李鸿章活动回任，而卒无成，则清

流的攻击，固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势，而右铭的愤激态度，实为决定性的因素。

翁李不协，其来已久，但翁同龢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，性情亦颇平和，对李鸿章实亦可谓之为“对事不对人”，故对李之回任直督，犹非坚决反对。但荣禄对直督之势在必得，及今观之，意向灼然可见。

原来慈禧太后之欲收权，早萌于甲午年间。其时翁同龢得君正专，益以张荫桓对洋务、财政的熟练，所以平章国事，举措由心，除非光绪特述“慈圣”之意如何如何，否则，翁决不建议请懿旨办理。至于对荣禄，视之蔑如，无论在督办军务处或总理衙门，均无发言余地，此实为荣禄所难堪。因为论资望，荣禄早在同治末年即为步军统领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户部侍郎，而翁署刑部尚在光绪元年，论私谊，彼此是金兰之交，从哪一方面看，翁亦不当目中无人。

大致后党媒孽帝党，往往运用“打狗看主人面”的逻辑，所以对翁之蔑视，荣禄向慈禧造膝密陈时，往往以“翁同龢没有老佛爷在眼睛里”为言。此最足以打动慈禧太后的心。以慈禧之老练、荣禄之深沉、李莲英之阴柔，对朝局洞若观火；翁外恃清流，内结荫桓，复奉恭王的名义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势莫与伦，计惟得一强藩，隐握兵权，缓急之际，方可举兵入清君侧，投清流于浊流之中。是故荣禄之觊觎直督，可说已非一日。

但李鸿章非翁同龢之比，所以荣禄决不敢轻举妄动，甲午战败，排李是一绝好机会，但仍出之以极端谨慎，因恐打草惊蛇，帝党会存戒心。更怕翁、李化敌为友，合力应战，故以王文韶由云贵移署直督。

用王文韶是荣禄所下的一着绝妙好棋。王文韶亦我杭人，《官场现形记》送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琉璃蛋”，照杭州人的俗语，便是“油煎枇杷核”。如此圆滑，自然不会翻前任的案，此所以安抚李鸿章。

同治年间，朝中有南北之争。北派奉李鸿藻为盟主；南派以沈桂芬为依归，壁垒分明，互为消长。王文韶为沈桂芬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主考的门生，光绪四年沈援王入军机，署兵侍，补礼左，兼在总署行走。其时军机由恭王领班，其下四大臣两满两汉，两汉即沈、王；两满则协办大学士宝鋆、户部尚书景廉。宝鋆为恭王密友，与沈投契；景廉则谨飭君子，无所作为。此时军机处谓之为沈桂芬一把抓，亦无可不可。

光绪六年正月，李鸿藻服阙复起，仍值军机。但孤掌难鸣，惟恃清流唱反调为牵制之计，恰如今之民主国家在野党之所为，国家大政，固犹在沈桂芬手中。

不意南派势力方盛之际,沈桂芬于这年除夕病歿。王文韶虽在南派,素为南士所轻,不足以承沈的衣钵,于是北派大举反攻,王文韶以云南报销案罢官,南派自此消沉。直至光绪亲政,翁同龢大用,接沈之余绪,复树南派之职。王文韶在基本上是南派,用他,亦所以安抚翁同龢,并松弛其戒备。

王文韶与陈右铭是旧交,加以荣禄正在罗致人才,有意将右铭收入夹袋,因得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,由直藩简放为湖南巡抚。

湖南巡抚本为吴大澂。此人为潘祖荫门下士,金石名家,而居官则以功名心热,有许多笑话。光绪六年随吉林将军铭安,办理西北边防,得一铜印,文曰“度辽将军”,大喜。在湖南巡抚任内,喜欢用洋枪打靶,曾三射中鹄,益以为文武兼资,可总师干。

甲午战败,朝廷以淮军不可恃,思复用湘军。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授为钦差大臣,督办东征军务,驻山海关。吴大澂亦自动请缨,率湘军宿将湖南藩司魏光燾等,开赴关外,受刘坤一节制。吴大澂开拔时,意气轩昂,王壬秋作游仙诗五首,于吴及其僚属,佛致讥讽。按王壬秋游仙诗,自作注解,而前后不同。笔者得观王诗亲笔之影本,录之如下(括弧中为自注):

(一)湘瑟秋清更怆弹(湘抚吴,于秋闱前匆匆启行),只言骑虎(余虎恩先求充营官,后不受节制)胜骖鸾。东华旧吏(黄自元)犹簪笔,南岳真妃(魏藩台)肯降坛?叔叔倘凭金换骨(曾钧广拜门生),陈平何用玉为冠(求贤馆诸生)。淮王自是能骄傲,却被人呼作从官(刘坤一总统诸军)。

(二)只学吹箫便得仙,霓旌绛节领诸天(江督刘授钦差大臣)。应知吴质难成梦(吴清卿先生,亦归节制),不与洪崖更拍府(李鸿章在关内,亦兼受节制也);金阙乍辞初授篆(时又遣张荫桓议和),神山欲望恐无船(铁甲皆毁,惟存木壳)。鸣鸡夜半空回首,惊怪人间尚早眠。

(三)新承凤诏出金阊(陈裕三),争看河西坠马郎(先守黄河,闻贼至称坠马走去)。幸不倚吴持玉斧(吴抚欲节制之,陈不受也),可能窥宋(宋庆在前敌)出东墙;劳拖仙带招燕使(张野秋因陈被劾为李鸿藻所唾骂),只借天钱办聘装(陈三长子克扣饷银二万)。曾受茅君兄弟诀(曾文正),休将十赍损华阳。

(四)郁金堂内下重帏(江督衙门最深邃弘敞),玉女无眠但掩扉(张制台不睡不见客,此二句活画)。尘暗素书长自读,月明乌鹊定何依(张之万、

额勒和布皆撵出);蛇珠未必能开雾,鸳锦犹闻劝织机(机器局昼夜防守)。莫道素娥偏耐冷,为天寒透五铢衣(余饮督署出时已五更)。

(五)东华真诰有新封(王文韶也),朵殿亲书御墨浓。眉妩莫描张(之万)敝笔,额(额勒和布)黄犹待景阳钟;仙家往事如棋局,夜宴来时带酒容。青雀定知王母意,几时瑶岛驾双龙。

上引五诗,第四首咏张之洞,时署江督,壬秋曾访之于江宁。第五首则咏战败后之部署,王文韶署直督,军机大臣张之万,额勒和布出军机,李鸿章赴日议和,所谓“青雀定知王母意”者,李赴日之前请训,得慈禧密谕,和局只许成,不许败。此外三首,所讥湘淮军宿将,据沃丘仲子《近代名人小传》,略作简介:

(魏光燾)字午庄,邵阳人。初为人司庖厨,继从左宗棠军征新疆,擢至道员,历方面。甲午,率旧部援辽,驻军牛庄,日师将至,全军望风溃逃;至析木城,方炊,闻猎人枪响声,误为敌军,弃炊具奔,一日夜达三百里,光燾坠马伤足,血涔涔,不自知也,至锦州魂乃定。明年,竟擢陕西巡抚。

余虎恩以湘军而曾隶左宗棠部下:

虎恩以武荫从左宗棠征回,并两世职封三等男爵,授汉中镇总兵,以获贼中窖金致巨富告归。甲午,从吴大澂御目无功,后以万金贖荣禄,留武卫中军,令统十营。

陈裕三为陈湜所叙特详,则以陈秀才,又为曾国荃姻家,与行伍出身者不同,所谓“曾受茅君兄弟诀”者,故持论较苛。陈湜初入军营,本为文职,偶以营官患病,代为传令,无意中获一长毛,搜身得洪秀全下陈玉成檄文,尽知“天京”防守之状,曾国荃大喜,重以姻娅,立保同知,因而起家。

亦就是以此渊源,陈湜成了曾国荃的心腹,曾在前线,往往委由陈湜看守老营,以致军功的保案中,总有他的名字,而实无赫赫战功,居然在光绪中“命绘中兴功臣于紫光阁”时,亦得滥竽其间。

陈湜早在同治四年,就已当到陕西按察使,后调山西,剿捻时,受命驻汾

州，节制文武，结果仍让捻匪张总愚窜入山西，因而获罪。沃丘仲子《近代名人小传》记：

积功晋臬司，以剿捻防山西。浞素渔色，军纪不饬，至晋久无功，乃饬提以闻，论罪遣戍，后释还。再赞左宗棠军，授江宁藩司，乞病假。甲午特起防辽，卒于军，视巡抚例议恤。浞开爽长于应敌，问机立断，以荒于色，晚岁致腿疾，不良于行。

此记与清史稿本传对看，有数处不符：（一）陈浞复起在光绪十二年。其时曾国荃为两江总督，奏请以陈浞“统水陆诸军，复出统南洋兵轮，总湘、淮诸军营务；（二）复起授职臬司，非藩司；（三）甲午特起防辽，先屯鞍山，至第二年初春，防守摩天岭的聂士成，调回关内，拱卫畿辅，由陈浞接防，未几和议即成，陈浞竟“因功”升为江西藩司，第二年方去世；（四）陈浞的腰疾由坠马而致。

所谓“只借天钱办聘装”何来？湘绮原注：“陈之长子克扣饷银二万”，及至收入湘绮诗第三种《杜若集》，则此句之下已改注：“卫汝贵领饷六十万，以十万寄家；如曹克忠辈十扣四五，较为廉洁，勿怪哭菜市也。”按：卫汝贵扣饷十万寄家，乃为其女妆奁之资，故云“办聘装”。清史稿本传：

卫汝贵，字达三，安徽合肥人。从刘铭传征捻，累迁至副将，晋总兵；事平，授河州镇。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，留统北洋防军，历授大同、宁夏诸镇，均未之官，统防军如故。光绪二十年，日朝战起，率马步六千余人进平壤，临行，鸿章诫以屏私见、严军纪。至牙山，退成欢，与日军相见；寻复趋平壤合大军，与副都统丰绅阿顿守城南江岸。平壤，朝旧京也。闻我军至，争携酒浆以献，而军士多残暴，掠财物、役丁壮、淫妇女，汝贵军尤甚。杀义定朝民，众滋忿，复蚀军糈八万运家，军大哗，连夕自乱，互相蹈藉；元武门岭失，即窜走……朝士交章纠其罪，诏褫职逮问。故责治淮军久，援朝时已六十矣，其妻貽以书，戒勿当前敌，汝贵遇敌，辄避走败遁，后日人获其牍，尝引以诫国人。明年，继送京师，按实论死。

按：甲午之役，朝鲜乞师，李鸿章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，率太原总兵聂士成往援。提督为一省武将之首，亦为汉人最高的武职。以后派赴朝鲜诸将，大

致皆为总兵，下提督一等，所以叶志超为前线最高指挥官。甲午陆军之败，叶应负极大责任。此人亦是李鸿章的小同乡，初在刘铭传军中，行伍出身，后为李鸿章所赏识，负练兵之责。清史稿本传：

（光绪）二十年，朝鲜乞师，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，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；志超迟留不进，鸿章责之，不得已启行而日军已据王京要隘。牙山兵甚单，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山，增陆军驻马坡；鸿章始终欲据条约，恐增兵为彼借口，勿许，并戒志超毋启衅。亡何，高升商轮运兵近丰岛，被击沉。士成谓志超曰：“海道既便，牙山绝地不可守，公州背山面江，势便利，战而胜，可据以待援，不胜，犹得绕道出也。”志超从之。日军逼成欢，士成以无援，败趋公州就志超，而志超已弃公州，间道出汉阳东，士成追及之。当是时，大军集平壤，乃卷甲而趋之，二日始至。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，铺张电鸿章，鸿章以闻，获嘉奖，赏银二万犒军，拜总统诸军之命。志超意甚满，日置酒高会，徒筑垒环炮为守；日军调至大同江，为我军逐去，遂以屡捷入告。时统帅居城中，日军夹江而阵，两岸相轰击；东、南二路战少利，志超莫敢纵兵，趋回城。日军乘间以济，据山阜，左宝贵出御之，被巨创，志超将私逸，宝贵不从，以兵监之。宝贵自守元武门岭，矢必死，登城指挥，为炮所中而殒。志超亟树白帜，乞罢战，日人议受降。请帅兵归，弗许，乃潜向北走，朝兵銜之刺骨，于其出城时枪击之，死者不可称计；日军复要之山隘，兵溃，回旋不得出，挤而死者相枕藉，诸将尽委械而去，于是朝境内无我军矣。志超奔安州，士成调安地备险隘，可固守，弗听，径定州，亦弃不守，趋五百余里，渡鸭绿江入边，始止焉。事闻，夺志超职，鸿章请留营效力，弗许；次年，械送京师，下刑部鞠实，定斩监候。二十六年，赦归，岁余卒。

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九，丁汝昌、卫汝贵、叶志超合一传，传后有论：

论曰：甲午之役，海陆军尽覆，辱莫大焉！汝昌虽有罪而能以一死报国，尚知畏法；汝贵、志超丧师失地，遗臭邻邦，醜然求活，终不免于国典，何其不知耻哉！